



好 读 书 读 好 书



严歌苓：将一段“芳华”酿成悲歌

复杂人性 青春芳华的悲歌

《芳华》透过故事的讲述者萧穗子等人的眼睛，让读者看到了上世纪70年代，一群从大江南北招募而来进入部队文工团的少男少女的隐秘故事。男兵刘峰与女兵何小曼、萧穗子、林丁丁、郝淑雯的纠葛命运，与大时代的洪流聚集在一起，让人唏嘘……严歌苓坦承，故事中有太多她本人军旅生涯的真实感悟，只不过是经提纯、虚构后呈现出来。

“山东老好人”刘峰与人为善，在年轻的文艺兵群体中实践着自己朴素的美德，获得很多褒奖和赞美。但在特殊的年代，他的美德换来太多五味杂陈。他矢志不渝地爱着林丁丁，但其表白却变成林惊惧的拒绝，其情不自禁的爱的碰触，变成事件被扩大化处理，他被批判，被下放，成了罪与恶的代名词，人生急转直下。就像刘峰经常穿着的两只不一样的鞋子，一只黑布鞋，一只练功鞋，两种鞋子，象征前后跌宕不同的两种人生。

而何小曼是一个失去父亲的“拖油瓶”，跟着母亲改嫁，被母爱伤害，被文工团演员欺负与折磨，她是故事的女主角，却拥有一段令人叹息的命运。她与刘峰的关系令人怅惘和叹息。

40年流转，一群傲气的芭蕾舞舞者，到了晚年各自凄凉。境

遇变迁，五种相同却又最终不同的青春，牵出大相径庭又出人意料的人生归宿。这是一代人热血又吊诡的“终将逝去的青春”，不唯美，但又是看不尽的刹那芳华。这里既有时代人物的宿命故事，又有纳博科夫式的灵魂战栗。最终，芳华酿成了一曲悲歌。

在近乎平静的叙事中，严歌苓温水煮青蛙，再次用手术刀式的凌厉，解剖出了埋藏起来的人性罪恶，让读者在“好人”与弱者身上看到复杂的人性。

最诚实的一本书 讲了大量的真话

为写赌场女“叠码仔”的故事《妈阁是座城》，严歌苓前往澳门赌场体验，为写《小姨多鹤》又多次去日本寻找素材，为创作《陆犯焉识》，多次赴草原体会劳改犯的生存环境……而严歌苓说，写这一段烙印着自己青春的芳华故事，则是自然而然的笔尖流淌。因其12岁到25岁的岁月都是在军队中度过的，故事中有其对青春浓烈的回忆。

严歌苓在部队跳了8年舞，演过无数遍《白毛女》《红色娘子军》《智取威虎山》，与战友们住在一起，吃在一起，练功在一起，朝夕相处。她说《芳华》是最贴近自己、最贴近亲身经历的一部小说，也是她最诚实的一本书。小说中，严歌苓甚至写了自己15岁时被男兵背叛的早恋，写给对方的情书被上交，她失去了角

色，怕离开部队，甚至想结束年轻的生命，多么灰色又残酷的青春烙印。

但《芳华》中也有严歌苓对自我青春的深刻剖析。“我在叙述人和我自己之间游离、变换，似乎是真的，又似乎是假的。占取了一个虚实之间的便宜，所以讲了大量的真话，也讲了很多我对当年一些战友，尤其是何小曼这样一个人物的忏悔，以及很多对青春岁月里的一些现象的反思。我一直在想，人群里对一个弱者的迫害欲是从哪里来的，这是我们人性中的一个弱点。”

军旅年华是严歌苓小说中绵延不断的主题，也是取之不竭的源泉。早期的《一个女兵的悄悄话》《雌性的草地》《穗子物语》等作品都在描绘那个时代的文艺兵。而这些作品中穗子、何小曼等人物的雏形，又在《芳华》中得到进一步淋漓尽致的展现和更加复杂深入的刻画。严歌苓称“穗子”是“少年时代的我”的印象派版本，其笔下的文艺兵形象各不相同，性格各异但又带有人性的支离破碎。

在严歌苓的小说中，少年与青春时代是混沌、感性和蒙昧的，也有些不忍卒读。就像《芳华》中写道：“四十年了，那座排练厅早被辗轧到大马路之下，让城市现代化给化了。那些留着我们年轻倒影的镜子呢？那些萦绕过我们琴音歌声和欢笑的冬青树呢？那座徘徊过我们秘密恋人的骑楼呢？粉碎得连渣子都没了。”

叙事的新探索 对时代的深刻反思

《芳华》在叙述技巧上的探索，再次成为学界的研讨对象。众所周知，严歌苓近年来尤擅小说技巧层面的探索，评论家陈晓明都称她的小说“技巧性很强”。有评论家认为，《芳华》描写青春与成长期，写出角色四十余年命运的流转变迁，对于并不从事非虚构写作并且一直以小说的虚构性、文学性为典型创作特征的严歌苓来说，不啻又是一种小说叙事的新探索，但她找到了不断轮换的叙事角度，跨越了这种挑战。

而对于《芳华》这部小说，评论家陈思和认为，严歌苓的角色代表了主流意识，通过这样一个主流意识来讨论特殊人的命运，呈现出一个好故事，这个故事不是作者的发言，是她通过三个女人的发言完成的，“三个女兵一台戏”，一台戏来讲古今。

小说出版后，评论家孟繁华对其评价是：“《芳华》是一部回忆性的作品，但它既不是怀旧也不是炫耀曾经的青春作品。话语讲述的是曾经的青春年华，但在讲述话语的时代，它用个人的方式深刻反省和检讨了那个时代，因此，这是一部今天与过去对话的小说。严歌苓显然是在同她的‘芳华’时代对话——那个时代并未终结，它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而且，人生之短暂、人生之无常，但好人会被记住，他合乎人性，他会温暖我们。”

本报记者 师文静



《芳华》 严歌苓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旅日作家李长声：以历史的冷眼看日本

旅日三十年 去了就是收获

1949年出生在长春的李长声，青年时代经历“文革”，跟赋闲在家的父亲学习日语。本来就热爱文学的他，渐渐对日本文学和文化产生了兴趣。后进入出版社，在长春《日本文学》杂志担任编辑，几年后升至副总编。

1988年离开杂志社后，为实现“亲眼看日本”的梦想，李长声自费踏上了旅日之旅。

临行前，他在写给老朋友、原《译林》杂志主编竺祖慈的信中说：“我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：‘勤工观社会，博览著文章’，这就是我设想的旅日内容。为活命，不得不勤工，而借此地可以学习语言，体验生活，观察社会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想多读点书，而读书的成果则表现在文章上。”

1991年春，竺祖慈到日本出差，李长声特地去宾馆见他。在宾馆大堂看见清洁工在擦拭玻璃，李长声说这活儿他也干过，后来接到一批翻译活儿，收入够他生活一段时间的，就凭着自己的兴趣闭门读书、著作，直到花完这笔钱为止。“日本书价高，车费（主要是跑书店和图书馆）贵，是我的两

大开支，真要命，别人可以不买书，我却按捺不住；别人可以逃票，我却做不来。”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《读书》杂志主编沈昌文邀请李长声开设“东瀛孤灯”专栏，写写当今日本社会，于是李长声开始用随笔的形式状写日本现状。此后，又陆续为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台湾等地的报刊写随笔专栏，笔耕不辍。如今已结集出版书籍《樱下漫读》《枕日闲谈》《哈，日本》《日下书》等十余种，并译有日本作家藤泽周平所著《隐剑孤影抄》《黄昏清兵卫》。

迄今，李长声在日本生活了整整三十年，他没有加入日本国籍，更愿意被称作“旅日作家”，依然践行着“一不指望发财，二不追求文凭，去了就是收获”的信条，心无旁骛地读书著文。

看日本 得有历史眼光

日本文学里，李长声最爱俳句和随笔，兴之所至，偶尔也写写所谓汉俳。他认为中国名家把汉俳写得像古典诗词，并没有俳趣，他自己写的更追求滑稽。三本自选集的书名也取自他的三首“伪汉俳”，分别印在封面上：雪地茫茫呀/如何踩上第一脚/人生想当

初；无尽地重复/噪音听来也耳顺/况且况且况且；满屏错别字/苍鹰误作了苍蝇/反正都能飞。从情境来说，所表现的分别是徒步、火车、飞机，人生不断地变换前行的方式，且越来越快。《雪地茫茫呀》讲的是日本生活及审美，《反正都能飞》讲的是日本文学及出版，而《况且况且况且》是关于日本历史与文化。

2014年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曾为李长声出过五册作品集，今年的三辑自选集较以往不但有了内容上的更新，写作风格也稍有变化。在好友、编剧史航看来，李长声在温厚、乐天、逗趣的文字中，时而“毒舌”一把。比如谈及“日本漫画走向世界”，李长声认为并不是日本将漫画推向世界，而是被盗版硬拉向世界的，自己的东西足够好了，自然而然就遍布世界了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粉丝，在李长声文中被称为“村粉”，“他们醉心于村上其人其作，不读其他作家的作品，一厢情愿地闹腾”。

当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写日本，为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提供了可能。有些人写日本，往往三句话不离中国，忘了是在写日本。“他们自己看着新奇，就当日本的好，而言下是中国总不如的意思。”顶着“知日派”的名声，李长

声却说“知日难，难在我们自以为知日，还难在能否历史地冷眼看日本”。

李长声自称：“我之于日本，爱不如哈日，憎不如愤青，却越来越想说它坏话了。这不是对日本看法有变，而是被一些中国人对日本的恭维惹烦了。”当今盛行的日本工匠精神，在他看来，“全世界的工匠都一样”，中国更是个工匠大国。日本手工艺的现况是气息奄奄，一方面被中国的廉价制品冲击，另一方面后继无人，因此日本才大力宣扬工匠，鼓吹工匠精神。

在日本知识界备受推崇的“知日派”人物周作人曾说过：“我们在日本的感觉，一半是异域，一半却是古昔。”常有中国人“到京都寻找唐朝”，李长声却认为“有点难”，看日本应该有历史眼光，眼前的日本是过去的发展。日本应仁动乱发生在1467年至1477年，长达十一年，整个京都几乎都变成废墟。丰臣秀吉掌权后重建，但不是恢复原状，而是大加改造。明治维新对日本传统又进行了一次大破坏，特别是废佛毁寺。因此，现代日本的很多所谓传统、建筑乃至习俗，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搞旅游而复原、重建甚至伪造的，后世日本人尚且不明底细，更何况外国游客。



《况且况且况且》《雪地茫茫呀》《反正都能飞》 李长声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